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

修辞结构成分 与语篇结构类型

李胜梅 著

**Xiuci
Jiegou Chengfen
Yu
Yupian
Jiegou lei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

修辞结构成分 与语篇结构类型

李胜梅 著

**Xiuci
Jiegou Chengfen
Yu
Yupian
Jiegou lei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李胜梅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39-2823-9

I. 修… II. 李…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②汉语-修辞-研究 IV. ①H14②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693 号

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

作 者 李胜梅

责任编辑 仲 江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苏 醒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100720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45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823-9/G · 539

定 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李胜梅，1965 年生于安徽含山，1989 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2001 年晋升教授，为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两次获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奖。教研室集体项目现代汉语课 1998 年、2004 年先后被评为省首批优质课程、国家精品课程。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出版策划：任 明

封面设计：苏 醒

老竹喜迎新竹枝

刘焕辉

今年这个春节过得特别愉快而充实。昨天刚为纪念自己大学时代一位老师诞辰百周年即将出版的一部《朱企霞文集》样稿献上一篇近万字的序言，今天又来为自己的学生李胜梅一部行将付梓的修辞学专著《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书稿（下称《结构》）贺序。前一篇收笔于甲申年除夕，后一篇起笔于乙酉年新正，前后才相隔一天，岁序却更换了一年，而所序书稿的作者竟相隔了整整三代人。此真可谓好事年年有，薪火代代传，令人喜不自禁！朱师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活跃在我国文坛的一位现代作家，胜梅则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我国修辞学界崭露头角的一名新秀。读朱师文集，我喜在自己身上仍有师承的某些影响，主要在刚正做人方面；看胜梅书稿，我喜在她出师门却能另择其道、独辟蹊径而行之，主要在学术旨趣和研究思路方面。若问对后者喜从何来？答案自然是教师的天性使然。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薪火相传”主要是“传”治学、立世之道，即培养学生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在专业上拼搏进取的精神和自我获取与建构新知的能力、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求其亦步亦趋，即使学生另立门户，独树一帜，也应为之鼓掌，这才有益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今手抚胜梅第一部独著的修辞学书稿，想起连她的研究生也纷纷考入全国名牌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了，不禁想起清人郑燮的一首《新竹》诗：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此情此景，确有一种“老竹喜迎新竹枝”的欣慰感，并由此而倍觉教师这个职业是如此崇高且富有诗意！胜梅熟悉我为人、为师之道，因此在明知其学术倾向与我不同的情况下，还要我为她这部新著题序。故拙序也从自己对师承关系的理解切入，谈谈对其人其书的印象和希望。

胜梅是我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从录取在本人门下那天起，她的人生步履都是在我眼皮底下走过的：从攻读现代汉语专业修辞学方向硕士学位到留校任教，由讲师至副教授、教授；从校内授业到带出去参加全国性学术活动，推荐她加入各种学会、结识自己在学界的新老朋友，及至放手任其信马由缰，单独拜师结友，打开新局面……这一路师生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旅程，大家都看在眼里。令人欣慰的是，她没有让我失望，从专攻修辞学到自学现代语法学、篇章语言学，终于在这几者之间找到了话语分析、语篇修辞的契合点和适合她本人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的生长点。这部颇具创意和功力的修辞学专著《结构》，便是她积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经验而献给社会的一份厚礼，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创新勇气实属难得，值得庆贺！作为她的老师，我可以负责地说，她的学风是踏实的，探索是勤奋的，脑子也是好使的。她不满足于修辞学的研究现状，总觉得不及语法学那样有一套可赖以持续发展的科学方法。自90年代以来，她跟我国修辞学界许多有志者一样苦苦寻觅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结构》一书正是她为此而上下求索的足迹展现。

该书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把前人和今人研究过的一些常见的修辞现象统统置于篇章的总框架中，逐一进行全面而深细的结构分析，确有不少地方发前人所未发。

首先是选择了考察修辞现象的制高点，视野更开阔了。就修辞研究而言，任何一种修辞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若脱离上下文就词论词、就句论句、就辞格论辞格，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道，但因受视野的局限，很难把问题说透以充分揭示其何以要这样修辞的“所以然”即规律性，这恰如苏轼那句有名的哲理诗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结构》棋高一着之处，在于立足于话语篇章的全局来考察每一种具体修辞现象，并把重点放在句际间的衔接上来分析描写修辞结构，从而揭示其篇章功能，情形就豁然开朗了。书中对许多常见修辞现象所作的结构分析之所以出现好些新亮点，便是由此而闪射出来的。就篇章语言学而言，该书以大量生动活泼的修辞实例的结构分析样品，为这门从国外引进的新学科注入了新鲜内容，从而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可以预料：从事话语篇章研究的学者对此书的兴趣可能不亚于修辞学界。

其次，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各种具体修辞实例的结构成分和类型的分析梳理特别深细而全面，许多地方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寻找并切分修辞现象的结构成分，作为尝试采用结构描写的方法来研究修辞现象的切入口，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胜梅研究修辞的突出特点，体现了她思维的细密和在充分占有语料基础上展开分析描写的踏实学风。其中有些是前人和今人已经作过不少分析的，如比喻、排比、镶嵌等辞格及语音修辞、词语修辞、句子修辞等方面的结构复现，该书可贵之处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一对其作出更为深细而全面的分析和内部结构规律的揭示；有的修辞现象虽然有人作过研究，但着眼点不在结构分析，而在修辞手段的选择或修辞效果的赏析，如同义形式和谐音，该书也一以贯之，从结构成分和类型方面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科学的分类；有的是从语法学界讲的“插说、独立语”这个“临时储藏柜”中提取出来的，如该书从篇章功能角度加以界定

的“言语自评和言语自述”，作者着重考察了它们在篇章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其置于全书卷首，颇具创意；最后是广告语篇和化妆品名称的用字用词和结构模式，这两章虽然有点近于“附录”，与前八章不属同一性质的修辞现象，但作为语篇分析来压轴还是适合的，况且由于这是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种语篇修辞新现象，贴近现实生活，故添上它更有生活气息。所有这些，该书均一概置于篇章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就其结构成分、结构类型、生成方式、理解途径、修辞效果、运用范围等逐一作出分析和描写，其中尤以对各种修辞现象的结构成分的剖析和类型的分类归并最见功力。这里仅举比喻和排比两个最基本的辞格“结构成分和结构类型”的分析两例，便可略见一斑。

先看比喻的分析。在汉语各种修辞方式研究中，没有比对比喻结构系统的分析、研究更充分的了。从宋代陈骙的《文则》到唐钺的《修辞格》、王易的《修辞学通论》，再到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及至改革开放新时期涌现出如吴士文、唐漱石等人的大批修辞学新著，都对比喻的结构系统（包括其内部结构成分、结构类型）及其修辞效果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还出了袁晖等人专门研究该辞格的《比喻》专著，胜梅的师兄姚亚平、师弟杨卓也对此作过由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转换生成机制的探讨，因此要做到有所突破实属不易！该书却另辟蹊径，“通过寻找比喻的形式成分和意义联系之间的对应关系，再通过寻找比喻的意义要素在言语形式上的具体表现来揭示比喻的结构系统”。作者在剖析比喻的结构成分基础上，从本体的特点（包括本体是否出现、本体的数量）、喻体的特点（包括喻体的风格色彩、喻体的性质和特点、喻体的意义类别）、本体和喻体之间对应关系的数量（包括一个喻体对应一个本体、具有类义关系的几个喻体对应几个本体、几个喻体对应一个本体）、本体和喻体的内容关系（包括本体和喻体的抽象与具体关

系、深奥与浅显关系、虚幻与真实关系、假设与真实关系、简单与复杂关系、动态与静态关系、相关与独立关系以及本体和喻体是否属于同一感觉)、本体和喻体的前后语序(包括本体在前喻体在后、喻体在前本体在后、思想的对象在喻体位置另外事物在本体位置、先用喻体比本体再用此本体去说明喻体)、本体和喻体的联系方式(包括词汇式连接、句法式连接、篇章式连接)、从比喻的进一步展开(包括当展开喻体的某一“边”时、全面展开喻之多边以说明本体的各个方面、顺势纵向展示喻体的某一特点、顺势展示喻体的正反两面)、从表达本体和喻体之间关系时的语气和口气(包括肯定式、否定式、肯定否定连用式、反问式)、从本体和喻体的语法性质(包括本体的语法性质、喻体的语法性质)、从单喻的组合运用(包括单喻、复喻、几个单喻之间的语法关系、比喻与上下文的联系)十个方面多角度地考察了比喻的类型,其“深、细、全”程度可谓集各家比喻研究成果之大成,甚至连钱钟书在《管锥编》、《谈艺录》中的研究成果也吸收进去了,却又没有机械照搬,而是融进了自己的心血和见解。(注:李胜梅考虑到书的篇幅,出版前删去了比喻这一章)

再看排比的分析。排比也是汉语修辞中一种基本的修辞方式,如果说比喻在篇章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的话,那么排比则相对具有其开放性特点,它与上下文的关联更密切。过去对排比的研究,大都在研究对偶的基础上来考察其形式特点和增强语势的修辞效果,跳不出逐个研究辞格的圈子。该书却将排比置于篇章背景下来分析其结构、类型、语义、效果,发掘了许多以前单个研究视而不见的规律,较之比喻分析的创见更多。作者看到了排比中三项或三项以上结构相同或相近的言语片段前后排列,以“结构复现”作为表达者在话语中临时设置的结构引导手段和结构回应途径,收到使句式均匀、节律铿锵、节奏感

强之效的特点，从而展开对排比的系统考察。该书提出了“排比块”、“排比项”这些在语篇分析中很管用的概念，从排比各项的言语形式复现程度、排比各项的语法性质、排比各项之间的距离、排比各项之间的排比原则、排比各项之间的语义关系等几个方面来看排比类型，从排比块的造句功能（充当句子成分）、排比块的谋篇功能（充当语篇成分或构建整个语篇）、排比块在语篇中与上下文的联系（一个排比块单独出现、多个排比块连用、多种复现块连用）等方面考察了排比块的特点，从排比各项的个体语义与排比块的整体表义、排比块在语篇中的整体表义传情效果、排比的修辞功能来看排比的语义与排比的整体表义等等，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出现在语篇中的排比结构成分和结构类型剖析的深细，确有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由此引出：

第三，善于不断吸取现代语法学和国外引进的篇章语言学、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及认知语言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汉语修辞现象，故能做到常中出新。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构》一书对修辞的结构成分与结构类型的分析如此精细及其所具的可操作性，且已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跟作者近年来关注语法研究新动向和吸收语篇分析新成果是分不开的。也可预料：该书对修辞结构和类型的分析描写，将受到语法学界的关注，因为语法学界现在也以开放的眼光来关注语义、语用平面，出现由专注于语言内部结构到兼顾言语结构探究的新动向。这多少反映了学科发展由高度分化走向高度综合化的大趋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语料的新鲜翔实。选例新且丰富也是《结构》的一大特点，这是胜梅继承我国语言学注重语料收集的学术传统的一贯作风，也是修辞工作者必备的科研素质。她的文章总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很少空发议论。该书每一观点的提出和每一子项的分析，都有大量贴近现实生活的例句支撑，不仅能增强说服力，还给人以新鲜感。所有这些，都不

是靠旦夕之功所能达到的。该书中的许多新亮点，绝不是想当然的产物，而是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之所获。至于是否都达到预期目的，是否尽如人意，那要待时间检验和学界公断，但能迈出如此艰辛的一步，总比原地踏步的好。

然学无止境，人的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教师，在学生取得的成绩叫好时，有没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提出来讨论的？掩卷沉思，我想跳出书稿，联系我国修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说一声：修辞现象的结构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失为一条新路，其好处在于减少主观性，增强可操作性和解释力，但也如语言本体各要素（如语法）的结构分析一样，恐怕是认识作用大于实践意义，尽管所分析的是言语的结构。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还得有人去做，但须摆在一个适当位置，不宜普遍提倡。假如大家都来分析修辞结构，即使如庖丁解牛那样剖析得精细入微，在人们的修辞实践中是否都用得上？假如《修辞学习》都登这类清一色的文章，又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中国语文》的读者面不广完全可以理解，这是由它以语言本体研究为己任的编辑方针所决定的；而于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修辞学科，若过分强调修辞结构分析就有待商榷了。这涉及修辞学的学科属性、对象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不妨顺便说点个人看法，与同行交流。都说修辞学的对象是修辞现象，可在各自著作中具体阐释和研究起来却很不一致，可又都以为自己的认识正确，别人的认识似乎还停留于表面或存在片面性。这不奇怪，由于修辞现象的极其复杂性和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研究目的不同，出现认识上的分歧是很自然的。修辞现象的复杂性源于语言现象的复杂性，它不像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那么相对稳定。纵观语言学史，人们对语言所下的定义多达几十上百种，现在还有新的定义提出，这就足以证明：学者们对语言现象的认识迄今还没有、今后似乎也不大可能获得一致的认识。徐通锵先生就曾在《基础语言学教程》中借用

“瞎子摸象”这个比喻来说明认识的艰难：摸到象鼻子的说它像一根粗绳，摸到象腿的说它像一根柱子，摸到象腹部的说它像一堵墙……你能说谁对谁错？所以徐先生很明智地说，我们不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着“瞎子摸象”的过程。至于要随语境和说话人的变化而变化的修辞现象，更不好断言只有自己才看清了“象”的全貌，是在从事着修辞本体的研究，别人都在外围兜圈子。不错，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定的结构形式，而不是一堆散乱无章的混合体，故对修辞现象进行结构分析是可行的、有价值的，但不能据此而否定对它作其他角度和层面的研究也属研究修辞的本体，那就势必要缩小修辞学的研究范围。都说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有的干脆说它是言语学，但究竟属于人文科学（science）或曰人文学科（discipline），还是像内部语言学那样兼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属性？这值得深究，由此而引出它的方法论问题。都说科学方法论的建立对于实现修辞学的科学化很重要，语言学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由方法论的突破而实现的。但修辞学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方法论？这就不能不涉及一个修辞观问题。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由此而决定具体研究方法。语言学史上任何一种方法论的建立，都是根据不同的语言观和研究目的而作出的明智选择，不是为方法而方法，探讨修辞学的方法论亦当如此。如果仅为赢得“方法竞技场”中的先进性，而忽视修辞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目标，我宁可采用老办法来达到本学科的研究目的。故修辞学界一般都是从讨论修辞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即修辞观入手来探讨方法论的，这是顺理成章之举。比如《结构》提到姚亚平著《当代中国修辞学》第六章第二节从古代和现代修辞研究中耙梳出来的七种具体研究方法，其实也是在前面各章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择取出来的，这跟曾毅平博士关于修辞学应当加强实证性研究以改善其科学形象的主张，认为“现实性、客观性、可操作性”是“实证性修

辞研究的基本特点”相比较，可以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诚如姚著所述，“问题在于修辞现象是一种人文现象，是人出于一定动机、为了一定的效果、在一定语境中运用语言对一定内容的表达”，并在充分论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分别处于两种不同学术形态的基础上，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人们对它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也引起人们的质疑：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精确化、客观化、形式化以及强调分析的程序化而排除综合性、强调定量分析而排斥定性分析、注重因果性的解释而排斥目的性的追求等等，在人文学科中是否同样管用？他还引用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观点指出，只有人创造的东西才能为人所理解，不为人所创造的东西可以说明和分类，但不能被理解，理解只限于人及其社会，而非人工制造的物理现象。这些，是很值得“效法自然科学所追求的客观性、抽象性、实证性和分析程序的可操作性以改善修辞学形象，力图向当前我国语言学界主流特别是语法研究靠拢”的朋友们深思的。须知修辞跟语法不同，吕叔湘先生曾在《中国语文》复刊后第一期《漫谈语法研究》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原则上讲，语法讲的是对和不对，修辞讲的是好和不好；前者研究的是有没有这种说法，后者研究的是哪种说法比较好。”研究语言（如汉语）中有没有这种说法，追求分析描写的客观性、实证性、可操作性并尽量使其形式化都是无可厚非的；而要研究哪种说法比较好，正如吕先生所说：“要看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对谁说话，上一句是怎么说的，下一句打算怎么说，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要求……总之是各有所宜。”而要解决“各有所宜”，就不是单靠把修辞结构客观地分析、描写清楚所能济事的。为使研究成果有助于指导修辞实践，我曾尝试联系修辞活动的主体因素和语境进行动态研究，以揭示如何根据说写目的和语境对语言符号作出“最佳组合”的规律。所谓最佳组合，就是要使组合而成的话语达到吕先生所

说的“各有所宜”的要求，故我在提出“组合论”之后，接着按“最佳组合”的要求而提出“适应论”来补充，这实际也是为实践陈望道先生关于“修辞所可利用的是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以适应题旨和情境为第一义”的主张所作的一点努力。诚然，语言符号一经组合成“达意传情”的话语，都有一定结构形式可供分析，但我们探讨修辞的动态组合规律，目的不在于追求结构分析描写本身的可操作性，而在于追求研究成果的管用，是基于修辞学的人文学科属性而追求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杨叔子院士说得好：“科学人文，和而不同。”科学是求真，可以实证，人文是求善，不能实证；但科学要以人文为导向，人文要以科学为奠基。故对此二者，不宜扬此抑彼。当然，从事人文学科研究也要讲科学态度，我以为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就是一种科学态度。汉语修辞研究在漫长历史中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基本上是一种人文科学形态。因此我们似不必为修辞学未能汇入目前我国语言学界的主流而不顾本学科性质，在研究方法上完全抛弃原有的学术传统，改弦易辙去照搬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亚平的态度是可取的。他在同一本著作中回顾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的思想演进时说得很客观，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昨天、今天、明天”的历史发展过程，科学的未来孕育于科学的过去，如何阐释过去就是如何走向未来，对过去作“全面否定与过分肯定都违背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这也反映了他思想的成熟。

无需掩饰，在修辞学乃至关于人际交往的其他语言应用领域，我对亚平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研究道路及其成果有点近于偏爱，这大概是学术旨趣和个性相投之故，而且由于他在科学哲学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好些地方比我做得成功；胜梅在这些领域跟我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子，但根据她的学术专长和追求，我却一直赞同她走自己的路并同样欣赏她已经取得的成果。这里没有一

点矫情，而是实际情况。在我指导的12届28名硕士研究生中，就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偏于宏观的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主要凭借演绎推理来使用收集到的语料，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其研究方法倾向于人文科学形态；一是偏于微观分析，在广集语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结构分析法，将其条分缕析地梳理、描写出来，其研究方法倾向于自然科学形态。前者以亚平为出色代表，成绩最突出。他的许多修辞学论著，既有居高临下的宏观理论思考，又能结合实际进行微观操作，思路清晰，概括力强；他的《当代中国修辞学》大气磅礴，纵横激荡，开合有度，充分展现了锐意创新的理论勇气和才气，令人读后确有李商隐在《寒冬郎》诗中盛赞韩偓少年诗才时的那种“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之感！后者以胜梅和梁丹丹、蒋平为代表，成绩亦很突出。她们都善于对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描写，尽管她们的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在微观分析方面都体现了思维的严密性和刻意创新的才气。这基本反映了目前我国语言学界的两种主要倾向，各有各的价值。本人的研究倾向显然属于前者，并将义无反顾地在这条“思想性重于技术性”的路上一走到底，但从不低估、更不反对别人走其他的研究道路，故对以上两类学生的研究成果都打内心感到欣喜和荣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教师的遇到学生另择与己不同的研究道路时，更应以健康心态为之鼓掌欢迎。清代思想家兼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与我写此序言时的心境颇为相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龚诗《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第一首的最后两句。前两句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写他虽被迫辞官、满怀离愁“吟鞭东指”故里，却仍有甘愿“化作春泥”来护育烂漫春花的情怀，此足堪为当教师的效仿。本人虽已远离喧嚣且年逾古稀，却深为学生的成长而高兴。中国传统师道向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誉，其美就

“美”在“出”而“胜”两个字上：能“胜于蓝”之“青”，毕竟还是出于“蓝”，所以才使当教师的引以自豪。这恰如“高于旧竹枝”的“新竹”，毕竟还是“竹”，而没有长成“蓬蒿”中的“杂木”，更没有长成“墙上芦苇”；“清于老凤”的“雏凤”声，毕竟还是“凤声”，而没有变成只会“学舌”的“鹦鹉声”，更没有变成专门取悦于人的“喜鹊声”！

梅花欢喜满天雪。一连经过几个暖冬的南昌，今年不是阴雨连绵，就是满天飞雪，格外显得寒冷。然而梅花却能顶风冒雪，绽放于冰封悬崖，终于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胜梅也是苦尽甘来，经历了10多年寒窗的磨砺，终于著成这部刻意创新的修辞学专著，为我国修辞学百花园内添上了一朵新葩。她自信、要强，不甘人后。记得当年曾勉励她要向几位师兄学习时，她自信地回答：“我们这些小的将来也不会让老师失望的。”当时我确曾为她的志气而暗自高兴。而今正当她探索有成之日，我却想起“成功始自贫苦日，失败潜于得意时”这句古训，故愿她也像梅花那样保持“不争春”的谦逊美德，在这群芳争奇斗艳之春不妨悄悄淡化自己，含笑于百花丛中，正确对待用其他方法研究出来的成果。生活的辩证法往往是后退半步，海阔天空；量宽方可得人和，长学养。

恰逢新春到来之际，胜梅经过十月怀胎，不仅在学术上捧出了《结构》这个新生儿，还添了一活泼可爱的千金，可谓人、学两旺。记得儿时在老家婺源过年，每当一元复始，读书人一早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忙吃，而是先铺开红纸，端端正正地写上“新正开笔，万事大吉”八个大字。现将这八个字送给还在月子中的她，以庆贺其双喜临门！

刘焕辉

乙酉年新正贺序于南昌大学览月斋